

文学的理想与精神 下

LITERATURE IDEALS
AND
SPIRITUAL

韩伟 著
Hanwei ZHU

I

高尔基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

II

哲理散文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智慧和自由的生命理性，是一种值得推重的文学体式，强调散文的哲学内涵，就是强调要借助哲学之力，用诗去体验生命的真纯。

III

宽松自由的批评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学术机制，是标立真正的批评精神的内在要求。这种和谐双赢批评环境的建构，是需要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努力来营造的。作家应该当有宽容的心态，善于“纳谏”；批评家也应该当宽严有席，不能落入“捧”或者“棒”的窠臼

IV

尽管不能武断地将原型理论牵强地用于所有的文化研究，尽管荣格的理论尚有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理论的生命力除了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历史的经验，还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当代生活中。

文学的理想与精神 下

LITERATURE IDEALS
AND
SPIRITUAL

韩伟 著
Hanwei ZHU



高尔基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

II
哲理散文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智慧和自由的生命理性，是一种值得推重的文学体式，强调散文的哲学内涵，就是强调要借助哲学之力，用诗去体验生命的真纯。

宽松自由的批评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学术机制，是标立真正的批评精神的内在要求。这种和谐双赢批评环境的建构，是需要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努力来营造的。作家应该有宽容的心态，善于“纳谏”；批评家也应该当宽严有席，不能落入“捧”或者“棒”的窠臼

IV
尽管不能武断地将原型理论牵强地用于所有的文化研究，尽管荣格的理论尚有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理论的生命力除了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历史的经验，还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当代生活中。



多元情结的凝聚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陈忠实中篇小说论

陈忠实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等，而且一直以农村题材的创作蜚声文坛，尤其是他的许多中篇小说写得非常深刻，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1993年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出版，陈忠实才成为评论界、文化界和普通读者所关注和熟知的作家。但是，对他的关注，也仅仅局限于对《白鹿原》的关注，而对他的其他作品就很少涉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忠实前后创作了八篇中篇小说，即《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十八岁的哥哥》、《蓝袍先生》、《夭折》、《四妹子》、《最后的丰收》、《初夏》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作家对农村生活变革的观察和思考，突出地显示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这些中篇小说独具匠心，其极富时代、政治色彩的矛盾冲突的构思、内涵丰富而耐人寻味的妇女命运的展示、细致而深刻的文化蜕变的描述、深沉而积极进取的情结主题倾向，都使作品产生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也使陈忠实中篇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无疑属于农村题材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在客观性的社会生活和主观情绪之间，更多地注重描写和反映群众生活；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更注重内容的厚重和历史、时代内涵，风格比较朴实；具有比较鲜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把自己的写作同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人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① 真实性是陈忠实中篇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陈忠实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具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的中篇小说采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多侧面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现状。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指出：“它汇集

^①李星：《新的崛起：在传统长河中——陕西作家论二》，见《西北小说研讨》第17页。



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也正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肯定《荷马史诗》提供了丰富的古希腊的历史资料的价值时所言，它把希腊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意识方式，都要描绘出一幅图画”，所以成为“认识希腊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最生动最单纯的资料来源了”。^② 笔者以为，这些评价也是对陈忠实中篇小说创作的最好诠释。

一、政治情结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题材。这时，中国人民一方面渴望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与贫困，一方面渴望尽快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足的社会，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统一的领导，党的领导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上一再出现失误，社会动荡不安，“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四清”乃至“文革”都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我们党没有把工作的中心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是夸大阶级斗争，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人为地造成干部与干部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由此，一些复杂的矛盾开始相继暴露。

“作为一个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一个知道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表现生活的作家，陈忠实无法回避迎面而来的现实的矛盾冲突，无法回避五十年代末以后的那些政治失误，在农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干部和群众带来的损害。”^③ 所以，陈忠实的创作，包括中篇小说的创作，保留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夭折》中的惠畅、《蓝袍先生》中的许慎行、《梆子老太》中的黄桂英和胡选生，以及《初夏》中的冯景藩等，他们的命运都与政治、与时代紧密联系。他们都曾在社会政治的压力下，发生过思想上的转变。惠畅，一个曾经的文学殉道者，在屡次遭受到左的思想的打击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

②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2页。

③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第6页。

逐渐走上了从商的道路。他的遭遇是非正常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乡村知识分子许慎行，因为一言不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不得不重新关闭刚刚打开的心灵之门，恢复到原来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姿态，即使在“平反”后，也没有从这种状态中走出，直到晚年。而《椰子老太》中的黄桂英，绰号“椰子老太”，她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心灵被严重扭曲，“嫉妒”和“窥视”把她推上了政治舞台，成就了她一生中一段“辉煌”。在“四清运动”中，她的多嘴多舌被工作组利用，把她树立为阶级觉悟高的典型来宣传，在运动结束时，她被工作组任命为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从此，她就被不知不觉地绑在了极“左”政治的战车上，开始了自己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生涯。“文革”时期，她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极“左”政治的工具。时时处处狠抓阶级斗争，打小报告，诬陷别人，使像胡选生一样众多的群众带上了“左”的帽子，由此，她变成了人们嫌弃、畏惧、报复的对象。而她的这种变态的政治积极性却深受上级部门的赏识。后来，改革的春风吹拂着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对这种变化，“椰子老太”却无法理解和适应。当党和国家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给冤假错案平反时，她才开始思考阶级斗争的错误与否。但可悲的是，麻木的她始终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能认识到自己在错误的路线、方针下充当了一个错误的角色。她又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孤独与落寞之中，只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众人的指责与抱怨中痛苦地死去，最终成为一个死了无人理的讨人嫌的“瘟神”。显然，“椰子老太”畸形性格的形成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背景，正是当时极“左”的政治路线造就了她的畸形性格，可以说她是极“左”政治的产物。

《初夏》中的冯景藩，在冯家滩的三代干部中，他是唯一一个经历过合作化、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而且至今还担负着党支部书记的老者。五十年代初期，年轻的冯景藩，不怕周折，不辞辛苦办起了社里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候，他与这个时代是融合的，他和群众心连心，为了群众、为了合作社他放弃了调任县支部书记的机会。六十年



代初期，回乡知青冯志强，立志改变冯家滩贫穷的面貌、挽回“大跃进”造成的惨重损失，但都被极“左”路线所摧残。在这个惨重的打击下，他绝望了，放弃了为群众办事的任何打算。后来，当历史进入新时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农村开始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与儿子冯马驹产生了矛盾。他们的矛盾是新旧社会历史交替的复杂演变和个人际遇的变迁所造成的。同样，作家的这种政治情结在他的其他中篇小说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反映。另外，《初夏》中的人物冯景藩的形象取材于作者的父兄，显得真实感人，这无疑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只是在冯景藩与儿子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肯定十分复杂，而作品对他的内心斗争描写过于简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总之，五十年代末，中国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所出现的失常状态，在他的中篇小说中都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只是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一而已。整体来说，这些都是经过了作家自己独特的观察和体验而创作的富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陈忠实的中篇小说是我们了解五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一面镜子。

二、女性悲剧情结

女性命运历来为作家所关注。陈忠实在他的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在他的这些优秀女性形象创造中，几乎全部赋予了她们悲剧性的命运。极“左”政治的扼杀，传统文化的压制，现代文明的背离等是导致她们悲惨命运的原因，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悲剧情结。

《椰子老太》塑造了一个悲剧性女性形象，她与所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按照传统的方式娶进了椰子井村，过起了平凡的日子。但是，几年过去了，问题出现了，她不能生育。对于一个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对她的议论，给她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她的心灵开始扭曲变形。由不能生育的自卑开始发展到希望别人也和她一样，产生了寻找自己“同类”的变态心理。“陈忠实紧紧抓住了文化心理结构这把钥匙，剖析造成人物畸形性格的深层原因，从而促使人们对这个人物的悲

剧性命运以及造成她畸形性格的原因深入思考。”^①“梆子老太”畸形性格形成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当时社会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但从根本上看，正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造成了“梆子老太”的畸形性格，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道德决定了她无法逃脱被世人凌辱的命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人被禁锢在封建伦理制家庭中，他们在家庭中的作用一是作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二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梆子老太”完全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她不能生育，这就好比给“梆子老太”的人生宣判了死刑。此外，她不善女工，不善茶饭，不会操持家务，这对于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女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从最初的个人窥视、嫉妒、到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人性的弱点和荒谬的时代结合在一起。梆子老太不仅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且也在这个悲剧时代一起制造着更多的悲剧人生。当然，她与社会的不相符合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极‘左’政治不仅给女人造成了苦难的悲剧，更是对人、对人性、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刻骨铭心的摧残和伤害。”^②与“梆子老太”不同的是，《康家小院》中的吴玉贤，她处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激荡时期，传统面临着现代的颠覆与挑战。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女性的命运应该得到改善，但她在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另外一种困境。

在《康家小院》中，传统文化赋予了康家父子内敛、本分、朴实、敦厚，等人格上的优点，他们受到乡里的尊重和认同，娶到了玉贤这样一个知书识体、孝顺贤惠的好媳妇。“吴三说，咱一不图高房大院，二不图车马田地，咱图得康家父子为人实在，不会亏待咱娃的……”。^③婚后，康家小院呈现出了一片祥和平静的气氛。在公公康田生眼中，儿媳是个好媳妇，而在媳妇玉贤眼中，公公康田生为人随和，好伺候；丈夫勤娃诚实、忠厚、勤俭。从作品的细节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三人间相互的认同与

①李晓卫：《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柳青的“典型理论”到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6页。

②赫牧寰：《陈忠实的女性悲剧情结》，见《学术交流》2008年第4期第155页。

③陈忠实：《陈忠实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08页、第219页。



满意，谦恭与礼让。其实，他们能够相互认同和理解的原因在于：康家小院生活着的三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和生活习俗，他们在“父慈子孝”文化力量的规范与制约下，获得了中国普通农民渴望的幸福和快乐。但对传统的恪守所产生的和谐与平静只是暂时的，传统必然面临着现代的颠覆与挑战。

识字学习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古老的乡村人从物质到精神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步，也是女性现代文明思想的萌生。当她第一次来祠堂学文化时，她看到了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杨老师，一个脸膛白净、年纪轻轻，留着文明头发，儒雅文明、知识渊博的先生。此时，我们看到了乡村普通乡民面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羞怯、恐惧与羡慕，而又被深深吸引的微妙复杂的心态。杨老师这个有着现代文明背景与身份的启蒙者，以他的言行打乱了康家小院宁静祥和的生活，打乱了一个新婚妇女原本无思无欲的混沌心态。通过朦朦胧胧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她看到了传统的落后性，开始试图从一个没有现代自由与自觉意识的传统人生状态中走了出来。此时，作者悲叹着古老乡民所遭受的现代文明的捉弄，理性地认识到了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以及外来文化的征服引起的被侵入者的心灵与生命的变动。当玉贤和杨老师的“奸情”败露后，玉贤欲上吊自尽，但被康家父子救了下来。随后，面对这个不守妇道的媳妇，勤娃整天对她施以极端的肉体摧残；康田生老汉整天唉声叹气。儿媳原本红润的脸膛，此时也让人看了觉得恶心。玉贤的父亲认为她丢尽了娘家的脸面，又在她乌兰青紫的淤血凝固的伤迹上，擦上了用皮绳抽打出的渗着血的印痕。母亲则在气愤之下，一遍遍讲起女人家活人千古不变的“真理”和农村妇女所应遵循的传统道德思想，“甬串门，少说是非话，女人家到一个村子，名声倒了，一辈子也挽不回来。在娘家长人哩，在婆家活人哩！”她受了很多苦，但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她依然从心里觉得为可爱的杨老师挨打她无泪可流。她要 and 丈夫离婚，和杨老师结婚，这是女性迈向自由选择婚姻的第一步，但当她得知杨老师只是和她玩玩而已时，她绝望了。此时，她对现代文明产生了无奈与厌恶之情。无疑，当这位“外来介入者”进入玉贤的视野时，杨老师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唤醒了她人性的自觉和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

理想，但现代文明又是以恶魔般阴险的嘴脸出现的，卑鄙、可怕、虚伪、不负责任。当她准备过上自己渴望已久的生活时，现代文明的启蒙者反倒抛弃了她，几乎把她逼上了自尽的绝路。所以，作家认为，文化的“外来介入者”并非是现代文化的启蒙者，而只是懦弱、卑鄙的好色之徒。杨老师也并非是现代文明的使者，并非想传播现代文明观念，也并非帮助普通乡村妇女进行精神上的解放，而只是想借助他所拥有的现代文明的资本来满足个体的肉欲。在这里，作家笔下的妇女虽然迈开了追求自由婚姻的第一步，但她无法摆脱被摧残的悲惨命运，走上了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双重抛离的境地。传统的、礼俗的文化抛弃了她，使她无家可归，因为她是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现代的、文明的、自由的文化也抛弃了她，因为现代文化是以虚伪的面孔出现的，而且现代文化与传统妇女的内在心理格格不入，所以，她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归宿，重又回到了传统文化观念的怀抱，使作品以反传统的思想开始，又以皈依传统而告终。作品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巨大的吞噬力，这既是玉贤的命运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玉贤这个女性形象的文化蕴涵和巨大的艺术价值也在于此。“她（吴玉贤）回到丈夫身边不光是旧的重复，更包涵了新的开始，玉贤的人生教训就在于面对新的潮流的冲击，不要轻易否定过去”，^①“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昨天的历史必须尊重”。^②此时，作品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时的矛盾心态，不仅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拒斥，而且对即将逝去的传统文化表达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女性要想真正摆脱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禁锢，必须首先克服自身思想的局限性，获得真正的独立。女性只有从思想上解放了，经济上独立了，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才能打破男尊女卑的局面，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这在中篇小说《四妹子》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四妹子，一个普通

^①李星：《一曲人性的悲歌——论陈忠实中篇新作〈康家小院〉》，见《文汇报》1984年3月6日。

^②武凤珍：《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及基本原则——以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初夏〉、贾平凹〈秦腔〉为例》，见《延安大学学报》2007年4月第29卷第2期第84页。



的陕北女子为生活所迫，依靠“出走”——嫁到关中，寻找梦想。作品在展现四妹子的生活轨迹中，反映了她从反抗到走向独立再到逐渐获得自由解放的过程。

在宗法社会中，女性毫无人身自由，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一切依附于男人。家庭是束缚她们的枷锁，她们在家庭中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传统宗法和家规进行，一切必须听从家庭中传统宗法制度的代表——家长的要求。“凡家里来了客人，亲戚也罢，外边啥人也罢，统统都由老人接待，晚辈人打个招呼就行了，不准站在旁边问这问那。”^①而且，不准大声说话，夫妻不得嬉戏，不准哼曲儿，不许开玩笑。在公公眼里，四妹子可以不会做饭，但不能不懂家规，所以她嬉戏、哼曲、和亲戚闲聊都被公公视为不成体统，认为陕北来的三媳妇没有教养。聪明而又泼辣的四妹子开始破坏封建家长宗法制——公公顽强保留着的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习俗，试图打破这个封建宗法制家庭原有的平稳沉寂的生活。她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压抑和奴役，在公婆慢待了自己的二姑后，爆发了第一次反抗。以后她屡屡“闯祸”，公公再也不能容忍这个陕北来的“女闯王”，断然做出了分家的决定。分家后，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丈夫愁眉苦脸，而四妹子却喜不自禁，拿出自己不顾挨批斗贩鸡蛋攒的钱盖起了两间属于自己小两口的房子，过起了盼望已久的自由生活。她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好机遇，跨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她不辞辛劳，贩小麦，后又办家庭养鸡场，在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请公婆来帮忙，而且发给他们工资。这说明，过去在公公面前低眉顺首、动辄得咎的陕北女子，今天却能指拨他，而且能让他心服口服地接受。过去装病从公公手中要到五块钱解馋、出气的她，今天却发给公婆五十块钱的工资，这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制家庭秩序，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女性终于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真正实现了与男女平等。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①陈忠实：《陈忠实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406页。

纵观陈忠实的中篇小说，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都是以悲剧的面孔出现的。作家从悲剧的视角出发，线型地展现了妇女从附庸地位走向独立自由的过程，“他以巨大悲悯关注着女性的无边苦难，并引导着我们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深入地思考。”^①这也是了解他的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窗口。此外，作家“陈忠实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入审视传统文化，拷问国民的灵魂，”^②他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注重把她们放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儒家文化环境和氛围中加以考察和描写。以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为尺度来解析她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表现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真实和人物心理真实，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的独特形象。“运用文化心理结构来剖析人物性格，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和重视人物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造成人物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使得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从中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③在四妹子、梆子老太、吴玉贤身上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农业文明的认知和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通过她们暴露了传统文化的残忍、腐朽和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三、恋土情结

作家陈忠实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村，农村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关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些都缘于他的恋土情结。他生于黄土地，所以他认为黄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和农村才是他写作追寻的根本，才是酿就伟大作品的土壤。他曾坦言：“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工作。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的创作必然归属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正是这种与土地和农民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使他们执著地

①赫牧寰：《陈忠实的女性悲剧情结》，见《学术交流》2008年第4期第155页。

②③李晓卫：《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柳青的“典型理论”到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6页。



关注着农村的发展变化，书写着农民的喜怒哀乐，形成了浓厚的恋土情结。”^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审美理想，陈忠实才创作了众多反映黄土地人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和“土地崇拜”意识，这对陈忠实的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和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理为己任，创作题材从来没有离开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农耕方式养成了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企盼风调雨顺过安稳日子的文化心理和勤劳朴实从田里找食的文化性格。土地对人的恩泽，使陕西人自然而然地在心里积淀成了依恋故土、不思拓迁、不慕异地的潜隐性思想和观念。这是生活在历史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城里人无法想象的，也正是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秉性形成强烈的对比。

陈忠实是“农裔城籍”的作家，他虽游走于大城市之间，但他的骨子里流淌的仍是“农村”的血脉，“他的所有小说，不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无一篇不是关于农村生活的，连作品里的人物都是农民，唯一一篇以工程师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收获》也是把人物置于农村环境来表现的。”^②另外，在《四妹子》中，当二媳妇和三媳妇吵架后，公公带有偏见地认为陕北来的三媳妇骂人更难听，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表现了关中人的自恋、关中对陕北外乡人的拒绝与排斥。作品《蓝袍先生》强调“耕读传家”，蓝袍先生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作者以农为本的思想。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展现了关中地区人民对于土地的依恋，这来自于作家对于黄土地的热爱。关中地区，土地肥沃，降水充沛，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适于农耕生产，所以相对陕北，人们不会饿肚子，而在关中地区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它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李建军曾分析过陕西三大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

①陈忠实：见《四妹子》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②公炎冰：《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5页。

漫的诗意，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①所以，关中人更安土恋家。

《最后的收获》中，当女主人公面临农村与城市两种环境选择的矛盾时，她开始惧怕新时期、新环境的到来，在新环境到来之前退缩了，开始迷恋起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放弃了城市好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开始留恋起这片故土，她无法割舍与乡村父老乡亲和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肥沃的土地之间的情感，虽然她对城市生活曾有过渴望和向往之情，但此时，更多的是对农村、对故土、对家乡的热爱，即对传统即将逝去的依依不舍。在中篇小说《四妹子》中，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在结婚时都要到城里去办理结婚用品，朦胧中表现出了一种农民进城意识，这在《夭折》中也同样有所表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农民进城的愿望在作品《最后的收获》中得到了实现，但女主人公却放弃了进城的机会，因为对土地的深深的依恋，这是作者自身的恋土情结在作品中的体现。

在《初夏》中，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同儿子冯马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争论的焦点是：面对农村及其艰难而贫穷的现实，当完全有可能摆脱开它而到一个安乐环境——城市的时候，是继续呆在这里呢还是赶快出走？是以自己的力量和血汗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擦洗这块沃土上不应有的屈辱，增添它原有的尊严和光荣呢，还是相反？在走与留的选择中，冯家滩三队队长冯马驹，鼓起了生活的风帆，坚定了带领社员大干一场的雄心，他不相信农村会一直贫穷、一直落后下去，而现在正是在农村做点事的时候。他唾弃那些单纯地认为农民的出路，青年人的理想的实现和才干的发挥，在于摆脱开农村这个苦难的深渊，进入城市的文明天地。作者的这种恋土情结也体现在了城乡对立上。“陈忠实没有像路遥一样，直接书写城乡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含蓄间接地隐含于青年男女的爱

^①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见《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20~30页。



情婚姻生活之中。”^①《康家小院》、《初夏》、《十八岁的哥哥》等一系列作品关注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和背叛与被叛这一关系到人格的重大问题，并延伸出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在这些作品中，恋爱双方的生活环境甚至出身的城乡差异被异常鲜明地凸显了出来。一方是已经或准备加入到“城市”行列的“城里人”，如《康家小院》中的杨老师，《初夏》中的文生，《十八岁的哥哥》中的刘晓兰；另一方是纯正的农民，如吴玉贤、彩彩、曹润生。在双方的感情决裂中，前者几乎全部准备背叛或者已经背叛了后者。所以，作者以诸如彩彩一样的人物为视角，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背叛者的憎恶。作家认为背叛者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赋予被背叛者的农民以自尊、自强的人格力量。显然，在城乡的矛盾冲突中，陈忠实把高尚的道德评价偏向于农村，偏向了他深爱的土地上的哪些他挚爱的农民朋友。这也正是作家恋土情结在作品中的一个面影。

作家的这种恋土情结有着明显的文化意味和乡土意味，它推动着作家为找寻在现代失落了的精神家园而不断思索和创作，为守望自己的心灵栖息之地而苦恋日夜萦绕于内心的故乡情感，也表现了作者的寻根意识——寻找故乡的“昨天”、寻找传统文化之根。

四、历史文化情结

陈忠实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黄土地上的农民的生存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深深地渗透在他的生命的灵魂中，铸造了他的文化历史情结。”^②在陈忠实的中篇小说中，作者有意选取了农村来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文化冲突。一方面，作者来自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另一方面，农村相对城市来说，社会变迁、转型的速度比较慢，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不彻底。中国农村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宗法社会有其自身的逻辑。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而传统的自给自

^①侯业智：《恋土情结的固守与释放——路遥、陈忠实恋土情结比较研究》，见《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2月第10卷第1期第120页。

^②丁润生：《文化历史情结与民族秘史探寻——陈忠实创作论》，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页。

足的社会严重阻碍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凸显了出来。

《四妹子》、《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等中篇小说就反映了作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思考。作家认为，“传统并不意味着愚昧，也并不意味着落后，而现代也并不完全意味着文明、进步。”^①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既要有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一些地方区域形成的民间民俗观念，同时也需要吸取当代新的文明与新的观念。在陈忠实作品中，我们发现他对传统既有深刻的反思，又有深深的眷恋之情，而面对现代既有热烈的向往又产生了质疑和困惑的矛盾心理。正如李遇春先生在2003年与陈忠实的对话中说：“根据我对您的作品的阅读印象，我觉得您的创作心理是充满矛盾的，特别是在文化价值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② 的确，《四妹子》、《蓝袍先生》揭露了传统宗法社会与现代社会、封建礼教与自由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通过对蓝袍先生六十年人生历程的描写，暴露了传统文化残忍、腐朽的一面，以及传统文化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在《康家小院》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不满，也有对现代文明侵入的惧怕。从反传统开始，又以皈依传统而告终。在《十八岁的哥哥》中，传达出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农村承受着新观念同传统文化的冲突时不可避免的痛苦和不安，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另外在《梆子老太》中，“小说塑造出梆子老太这个性格被严重扭曲的独特的悲剧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了封建礼教和建国以来党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所带来的危害，而且作者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剖析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挖掘造成人物畸形性格的深层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化根源上挖掘民族劣根性的原因。”^③ “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从身后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上塑造和刻画她们，挖掘形成她们心理结构的深层原因，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既达到高度的生活真

①代江平：《尴尬：传统与现代之间——陈忠实小说论》，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②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七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08页。

③李晓卫：《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柳青的“典型理论”到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5页。



实，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①可以说，陈忠实的中篇小说满载着历史文化元素，让人们在历史文化的情结中品味作品的厚重。

总之，从陈忠实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来看，作家的心理里是充满矛盾的，正如李遇春所说：“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作家都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从事着辛勤的艺术探索，但他们都陷入了进退失据、顾此失彼的尴尬。”^②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农村与城市环境选择的困惑、地域之间相互排斥的茫然依然存在着。这是矛盾也是一种困境。陈忠实的这种矛盾、困惑和茫然在具体的作品中表现为多元情结的凝聚，同时也正因如此，激活了现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为他的文学创作镶嵌上了耀眼的辉光。

①李晓卫：《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柳青的“典型理论”到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7页。

②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七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09页。



意义的发现：历史文化与诗性情怀

——读厚夫的《走过陕北》和《行走的风景》

《走过陕北》和《行走的风景》是作家厚夫的两本散文集。这两本散文集在题材上有着一定的延续性，书中所反映的都是关于陕北的历史文化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书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而作者所描写的陕北，也不是狭隘的陕北，而是延伸的陕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北的延伸。作者眼里的风景，也不是平面的、单调的风景，而是立体的，贯穿于历史的大风景。陕北，这个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膏腴之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作者将思考的原点放置在整个陕北文化系统中，通过对陕北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废墟、古迹的寻访来阅读和思考陕北，与陕北的历史进行有意味的对话。作者立足于陕北的土地与生活，以一种睿智的诗性情怀，发掘出沉积于陕北历史之河的“英雄”，以及流淌在陕北人血液里的“英雄气质”。作者钟情于这片生长的土地，真实地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眼泪与欢笑。作者的笔触有时候游离到陕北之外，这是一种以陕北人特有眼光和观念来看外面的世界，是一种独异的文化视角。

一、走进陕北：与历史和未来握手

对于历史人文的感受与挖掘，促成了作者独特的文风与视角，也注定了他的文章不是肤浅的文字堆积，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而是饱含真情的热爱眷恋；不是辞藻华丽的修饰赞美，而是深沉厚重的历史体验。陕北的黄土地，是他固守的精神家园，历史的长河中，有他独自行走的潇洒与飘逸。由此，他的作品展现出这样的特征：“作者融史料、知识和思辨为一体，通过有思想的头颅表现出对人生际遇和历史文化的理解”。^①

^①梁向阳：《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见《延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